

阿拉伯国家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双重性*

陈天社

摘 要: 基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共同利益,阿拉伯国家均支持巴勒斯坦人事业,这为巴勒斯坦人的长期斗争提供了可能。然而,在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同时,阿拉伯各国又有着不同的利益考量,这对巴勒斯坦问题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在深层次上反映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即阿拉伯民族主义往往是实现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利益的一种工具或手段。

关键词: 阿拉伯国家; 巴勒斯坦问题; 阿拉伯民族主义; 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

作者简介: 陈天社,博士,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河南郑州 450001)。

文章编号: 1673-5101(2008)04-0045-07

中图分类号: D371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比较与角力——巴勒斯坦问题中的阿拉伯因素研究”(07JA770002)的阶段性成果。

巴勒斯坦问题的产生、延续与解决,与许多复杂的因素有关,阿拉伯因素即是其一。巴勒斯坦问题是阿拉伯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领域,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展现的舞台。但同时,阿拉伯各国对该问题的政策,又体现了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特点。可以说,巴勒斯坦问题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交汇点。通过对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政策研究,不仅可以揭示阿拉伯国家对巴问题施加的影响,也能从一个侧面展示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本文试以埃及、叙利亚和约旦为例加以说明。

一、支持巴勒斯坦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需求

基于共同的语言、宗教与文化,阿拉伯国家无一例外认同阿拉伯身份,均加入了阿拉伯联盟,从而具有阿拉伯属性并衍生出以阿拉伯统一、团结与合作为目标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阿拉伯世界的一员、作为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耶路撒冷的所在地,巴勒斯坦的命运无时不受到阿拉伯兄弟的关注,巴问题成为当代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展现的舞台。

在阿拉伯国家中,尤以与以色列处于对抗前沿的埃及、叙利亚和约旦三个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最为关注。1947年11月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决议通过后,阿拉伯国家集体反对。1948年以色列成立后次日,阿拉伯国家出兵巴勒斯坦。在这次战争中,埃及、叙利亚和外约旦三个国家分别

出兵 7000 人、5000 人和 7500 人^{[1]67}，但最终失败。1987 年 12 月爆发的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起义、2000 年 9 月爆发的阿克萨起义，都得到阿拉伯兄弟的同情与支持。如约旦为支持巴勒斯坦人阿克萨起义，召回了驻以色列大使。在美国和以色列拒绝把阿拉法特作为谈判对手、甚至将其封锁在拉姆安拉官邸的情况下，约旦明确表示支持阿拉法特。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 2002 年 1 月指出：“我们对巴勒斯坦的立场是清晰而战略性的，我们支持在合法的巴勒斯坦人代表、巴民族权力机构阿拉法特主席领导下在民族土地上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2]70}

在 20 世纪九十年代后的巴以和平进程中，阿拉伯国家是巴勒斯坦人的有力支持者。如在奥斯陆协议的谈判过程中，埃及就起了独特的桥梁作用。^①正如埃及前驻华大使穆罕默德·努曼·贾拉勒博士所言：“虽然美国自和平进程之初即起了一种主要作用，但不能忽视埃及的核心作用。萨达特总统亲赴耶路撒冷为和平开拓新路，每当和平进程陷入僵局时，埃及总是帮助克服这些困难与障碍。”^{[3]2}巴勒斯坦驻阿盟大使萨伊德·加马尔也肯定埃及在这方面的努力：“巴勒斯坦人信任埃及，没有它，我们将不能坐到谈判桌前。”^[4]2006 年以来，埃及、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为调解巴内部派别的冲突，进行了多次斡旋。

当代阿拉伯领导人几乎全把巴勒斯坦事业放在阿拉伯民族斗争的首位。作为阿拉伯世界有影响的大国，埃及三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巴问题。纳赛尔曾亲自参加了 1948 年巴勒斯坦战争，对巴勒斯坦人十分同情。1954 年他公开说：“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仅他们遭受的痛苦和折磨，就足以打消为以色列辩护或证明它无辜的借口。”^{[5]12}纳赛尔去世前，还在为调和巴解组织与约旦的冲突而努力。萨达特因与以色列实现单独和解而备受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国家的非议，但他也十分渴望解决巴问题。1977 年 11 月，萨达特在以色列议会演讲时强调：“没有巴勒斯坦人，就没有和平可言。你们将《贝尔福宣言》作为你们立国的基础，但如果你们发现把自己的家园建立在本不属于你们的土地上，你们就有义务理解巴勒斯坦人为重新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自己国家的愿望。我告诉你们，不承认巴勒斯坦人、不承认巴勒斯坦人回归权的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6]140-141}在 1978 年戴维营谈判、1979 年埃以和平条约谈判中，他力图把巴问题与埃以和平挂钩。1979 年埃以签订和约后，埃及和以色列就巴自治问题举行了十余轮谈判，但未果。直到 1981 年 8 月他最后一次访美时，萨达特仍强调：“以色列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巴勒斯坦问题不是联合国安理会 242 号决议中所说的人道主义问题，巴勒斯坦人应当有自己的祖国，而巴勒斯坦人则必须承认以色列在其边界之内的存在。”^{[7]157}穆巴拉克总统也十分关注巴问题。1983 年，在阿拉法特被反对派围困于黎巴嫩之时，正是穆巴拉克的外交努力才使后者逃过一劫。正如长期任巴全国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的哈拉德·哈桑（又名阿布·萨耶德）所言：“没有穆巴拉克给予他政治上的掩护，阿拉法特将手中无牌可打。”^{[8]480}九十年代后，穆巴拉克是巴以谈判的重要中间人之一。

叙利亚领导人同样非常重视巴勒斯坦问题。1971 年 8 月 1 日，阿萨德总统在叙利亚武装部队建立 25 周年发表的讲话中指出：“当代的第一个阿拉伯事业——巴勒斯坦事业代表了最大的权利和正义……战斗是解放阿拉伯土地和恢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权利的唯一道路。”^{[9]248}1988 年 10 月，叙利亚外长沙雷指出，叙利亚政府认为召开由巴解组织和其他有关各方参加的中东和平国际会议将是公正、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唯一合法途径。^{[9]262}长期以来，阿萨德以各种方式帮助巴解组织，为其提供训练基地、武器以及情报。

约旦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度也不亚于埃及和叙利亚。2007 年，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先是会晤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和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敦促双方“以深入和谈促进和平进程”；接着会晤了美国总统布什、国务卿赖斯等，呼吁国际社会“以实际支持促进和平进程”；

①参见陈天社：《埃及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影响》，载《世界民族》2005 年第 3 期，第 24～26 页。

他还会晤了东盟和埃及、沙特等国领导人，建议阿拉伯国家“以团结态度促进和平进程”，年底又敦促以色列从所有阿拉伯被占领土撤出，认为这是中东地区建立“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先决条件。2007年12月3日，阿卜杜拉二世在约旦新一届议会会议开幕式上致辞时说，只有以色列结束对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的占领，并执行相关国际决议从这些地区撤离，才有可能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的和平，保证本地区人民拥有一个安全的未来。^[10]可见，阿拉伯国家与巴勒斯坦问题息息相关。阿拉伯国家是巴勒斯坦人争取合法民族权益斗争的支持者，是巴以和谈中巴勒斯坦人的后盾。特别是在目前，当巴勒斯坦内部出现分歧时，阿拉伯国家又是巴勒斯坦内部派别斗争的调停者。

二、各国不同的利益考量：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表现

虽然阿拉伯国家均认同其阿拉伯属性，有着共同的阿拉伯民族利益，但阿拉伯民族的长期分裂、方言林立、殖民者的分而治之，加上阿拉伯民族独立基本上是以地区为单位建立起民族国家的，这使得阿拉伯国家又有自身的地方属性，产生了以本国、本地方利益为重的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这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1. 埃及：确保东翼安全，实现地区领导权。埃及之所以高度关注和积极介入巴勒斯坦问题，除了阿拉伯民族利益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确保自己的东翼安全。历史上列强多次由东面入侵埃及，特别是公元前1650年希克索斯人入侵埃及并迫使埃及人南迁，使埃及对东翼安全十分关注。1948年以来埃及屡屡败于以色列，更使埃及对东方的安全忧心忡忡。埃及和谈中的埃及代表布特罗斯·加利对此深有体会：“希克索斯王朝迫使埃及人南迁，使埃及人把东方看作危险的源泉；而今天，由于以色列的缘故，埃及把目光放在东方。”^[11]¹¹⁰ 巴勒斯坦也是埃及通往东方的重要通道，历史上埃及多个王朝占领过该地并以此向东扩张。因此，巴勒斯坦是埃及保护东翼安全传统上的防御地带。二是使巴勒斯坦问题服务于自己的地区战略。埃及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在阿拉伯世界中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实力，为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发挥影响提供了基础。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导者，是埃及当政者的不懈追求。巴问题为埃及发挥其在阿拉伯世界领袖作用提供了重要舞台，是埃及实现地区领导作用的一张牌。纳赛尔时期，埃及主导组建巴解组织，就是力图把巴勒斯坦人的斗争控制在自己手中；1969年，纳赛尔支持法塔赫加入巴解组织，就是企图通过法塔赫来掌控巴解组织。萨达特在埃及和谈中力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也是希望把该问题的解决纳入到自己开创的阿以冲突解决道路中来。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积极促进巴以和谈，充分发挥了埃及在阿以之间的调解人角色，借以实现了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作用。

2. 叙利亚：两大现实目标，暗藏“大叙利亚梦想”。叙利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与介入，不但出于阿拉伯兄弟情谊，而且出于自己的目标。专门研究叙利亚问题的以色列学者摩西·马奥茨对此有清楚的剖析：尽管如同大多数叙利亚人一样，阿萨德在思想上或许比其他所有的阿拉伯领导人都更加忠实于巴勒斯坦人的事业，但他主要还是利用这一事业来促进在国内外两方面的目标。尽管阿萨德在无数场合宣称他本人以及他的国家忠实于巴勒斯坦人事业，始终以各种方式支持巴解组织，但他的主要目标是控制巴解组织，使它成为自己的政策工具。尽管巴解组织与叙利亚长期保持着战略联盟关系，但是当它试图在实质上保留独立性时（即独立于叙利亚，也独立于其他阿拉伯国家），阿萨德便不时地与它发生冲突，限制其活动，甚至以武力来镇压。^[12]¹³³⁻¹³⁴

除了现实的目标追求外，叙利亚的巴勒斯坦政策还有更深层的战略意图，即“大叙利亚梦想”。阿萨德是一位以统一阿拉伯为己任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其阿拉伯统一的核心是大叙利亚，巴勒斯

坦是这一战略的一部分。对此，20 世纪七十年代经常同阿萨德会面的黎巴嫩德鲁兹派领导人卡迈勒·琼布拉特认为：“大马士革的统治者要巴勒斯坦人不要忘记 1919 年中东被分裂以前的岁月，当时黎巴嫩人、巴勒斯坦人、约旦人和叙利亚人同属一国居民，他们是生活在往昔叙利亚自然边界里的人民，阿萨德总统曾对阿拉法特明确地强调过这一点。当时他对阿拉法特说：‘你们在巴勒斯坦的代表性并不比我们更多。根本不存在什么巴勒斯坦人，也不存在巴勒斯坦实体，唯一存在的是叙利亚，你们是叙利亚人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是叙利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2]128}。学者杨辉也指出：“在大叙利亚思想的指导下，叙利亚总是把巴勒斯坦事业看作自己的事业，并认为自己是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者和保卫者，常以巴解组织的“老大哥”自居，总想把它置于自己的控制和政策影响之下，以提高自己在阿拉伯世界和阿以冲突中的地位和作用。”^{[13]246}

3. 约旦：出发点在国内，背后隐藏着“哈希姆王国情结”。约旦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焦点在国内。其一，巴勒斯坦政治变化与约旦政局关系密切。约旦 60%的人口是巴勒斯坦人，手足之情与对故土的依恋使约旦巴勒斯坦人对巴问题十分敏感，被占领土巴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在约旦引起波澜。巴勒斯坦毕尔宰特大学政治学学者阿里·迦巴威（Ali Jarbawi）对约旦和巴勒斯坦局势的发展这样分析到：“约旦对巴以自治原则宣言（即奥斯陆协议）的恐惧是其焦虑的主要原因。这个新生成的巴勒斯坦实体在以色列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庇护下可能会不断成长，将会超越自治的界限。到那时，当新生的巴勒斯坦实体由于以色列而不能向西扩大时，它将向东扩张。”^{[2]55}其二，约旦国内大量的巴难民是影响约政局的重要因素。据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署的统计，到 2000 年，约旦约有 150 万巴难民，约旦政府每年要为安置这些难民支付 3.5 亿美元。^{[14]50}大量巴勒斯坦难民给约旦带来许多负面影响：沉重的经济负担、巴难民营的“国中之国”地位对约旦国内的社会安全与稳定造成隐患；约旦面临着以色列所谓的“约旦就是巴勒斯坦人祖国”且不想解决巴难民问题的压力。许多约旦精英人士认为，只要回归权不给予约旦的巴难民，那“约旦就是巴勒斯坦”的恐惧就会存在。^{[2]60}可见，由于巴问题与约旦国内形势密切关联，约旦对巴政策的首要目的是减少巴问题对约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不利影响。

在约旦关注巴勒斯坦问题的背后，还隐藏着“哈希姆王国情结”。阿拉伯帝国解体后，重建统一的阿拉伯国家是所有阿拉伯人梦寐以求的目标。对穆圣所在的哈希姆家族的后裔来说，建立以哈希姆家族为首的阿拉伯王国，无疑具有特殊意义。作为哈希姆家族的后裔，约旦王室一直为此而奋斗。侯赛因·本·阿里、费萨尔的努力就是例证。尽管和其父、其弟有政见分歧，外约旦埃米尔阿卜杜拉同样有重建哈希姆家族权威的宏愿，只不过他本人要当国王，而巴勒斯坦就是他目标的一部分。早在 1921 年英国派他任外约旦埃米尔时，阿卜杜拉就提议将外约旦和巴勒斯坦合并，由他任国王，但被否决。1943 年 4 月，阿卜杜拉正式提出“大叙利亚计划”。该计划有两种方案，主张在历史上的叙利亚地区实现统一或建立联邦，而阿卜杜拉都要当国家元首。^{[15]144}该计划因强烈的扩张哈希姆家族势力的意图而遭到埃及、沙特等国的坚决反对。直到 1988 年，约旦才宣布与该地脱离行政和法律上的关系。可见，“哈希姆王国情结”在约旦王权统治中有深远的影响，今天约旦对巴勒斯坦的许多举动，其影响力仍依稀可见，如约旦一直试图保持在耶路撒冷的特殊地位就是最好的例子。1967 年以色列占领东耶路撒冷后，约旦每年仍要为那里的 2000 多位神职人员和管理人员支出 1700 万美元的工资，并负担大笔维修费用。^{[14]297}在 1994 年 10 月签署的《约以和平条约》中明确规定：“按照以色列—巴勒斯坦原则宣言的规定进行永久地位谈判时，以色列将特别优先考虑约旦在圣地（耶路撒冷）的历史地位。”^{[14]297}可见，在支持巴勒斯坦人的背后，阿拉伯国家同时是把巴勒斯坦问题作为谋取自身利益的一张牌。正如一位驻中东的中国记者所言：“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讲话，无论是彼此之间，还是与外国领导人抑或对本国民众，开口闭口必谈巴勒

斯坦问题，这早已成了思维定式和语言习惯。这是因为，一方面，巴勒斯坦人遍布阿拉伯世界各国，各行各业都有他们的身影，居住国不可能回避他们存在的事实；另一方面，巴勒斯坦是一块张扬自身正义形象的招牌，一块在任何政治场合和外交活动中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润滑剂，是一个借以抬升本国地位、扩大在地区乃至国际影响的筹码。”^{[16]37}从总体上看，埃及、叙利亚和约旦三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介入，均有国内和地区两个层面的意图，但其侧重点不同。埃及、叙利亚主要是为了谋取地区利益，而约旦的基本出发点在其国内因素。

三、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影响

巴勒斯坦问题的演变史表明，正是基于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财政和道义上的支持，巴勒斯坦人争取民族合法权利的斗争才得以进行和延续。在巴以和谈中，如果没有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巴人将无法和以进行讨价还价。巴问题的最终解决，也无法离开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但是，阿拉伯国家对本国利益的算计，对巴人的斗争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其一，是导致 1948 年巴勒斯坦战争中阿拉伯人失败的重要因素。以色列前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这样描述了阿拉伯国家在此次战争中的企图：“埃及人的推进势头是最无情的，虽然在所有入侵军队中，可以肯定，埃及人得到的好处最少；阿卜杜拉有理由，而这是个坏的理由，但它是存在的，他的目的十分明确：他要巴勒斯坦全境，尤其是耶路撒冷；黎巴嫩和叙利亚也有理由，他们两国希望能平分加利利；伊拉克也要参加这场流血战争，作为额外利益，获得地中海的口岸，如有必要，可通过约旦。但埃及没有真正的参战目的——除了抢掠、破坏犹太人建设的一切。”^{[17]218}阿拉伯国家的勾心斗角，为以赢得了喘息之机，从而迅速扭转了局势。巴人对此非常痛心。巴勒斯坦人穆萨·阿拉米说：“在敌人面前，阿拉伯人没有统一起来，只是几个集团，而不是具有统一意志的民族整体；他们彼此戒惧，互相监视，尔虞我诈。他们所关心的事和指导他们的政策，不是打败敌人和从敌人手中把巴勒斯坦拯救出来，而是在这场地斗争结束后会出现什么局面，谁将会在巴勒斯坦占据统治地位或谁会把巴勒斯坦据为己有，以及他们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野心……在内心深处，他们希望一切全是自己的，哪怕是残羹剩汤。他们的大多数还要急于防止他们的部队先上去。”^{[18]181}当时还是大学生的阿拉法特对此也是深有感触：“巴勒斯坦人被软弱的、腐败的阿拉伯国家所出卖。”^{[8]79}可以说，阿拉伯国家在巴问题上的内讧，是 1948 年巴勒斯坦战争中阿拉伯阵营失败的内因。

其二，使巴勒斯坦人处境艰难，常常孤立无援。除约旦外，阿拉伯国家均没有赋予巴难民公民身份，对境内的巴难民予以种种限制。法塔赫创始人之一、曾担任巴武装力量副总司令的阿布·杰哈德（Abu Jihad）称（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就是监狱：“我们在难民营的人民，是完全被隔绝的。他们不允许我们有任何行动自由，不准我们就巴勒斯坦问题发表言论和撰写文章，不准建立组织和游行示威。我们试图组织起来的一些人则被视作为间谍来对待。”^{[8]90}直到今天，大批的巴难民依然漂泊不定、生活在难民营里，他们既无国籍也无公民权。巴人实际上常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出于自身利益，阿拉伯国家常常在巴人危难之时却不予以援助。如在 1982 年以色列包围黎巴嫩巴解组织总部时，阿拉伯国家的民众纷纷请战，而阿拉伯国家的政府仅仅在道义上援助巴人，没有一个出兵救援。对以动辄封锁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举动，阿拉伯国家多是舆论上的谴责，实际上并没有采取多少救援行动。最近发生的加沙人道主义危机就是例证。不仅如此，一些阿拉伯国家还对巴人大打出手，如 1970 年的约巴冲突、黎巴嫩内战中叙利亚军队对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围攻。

其三，阿拉伯国家的这些举动导致巴勒斯坦问题的延续，对巴问题的解决产生了消极作用。为了能继续打巴问题这张牌，阿拉伯国家普遍有延续巴问题的意图。《阿拉法特传》的作者阿兰·哈特指出：“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对整个解放巴勒斯坦问题有历史的、传统的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每个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都有这么一点想法，希望没有要解决的巴勒斯坦问题。”^{[8]476}此外，阿拉伯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还制约着巴问题的解决。由于巴人处于弱势地位，使得他们离不开阿拉伯兄弟的支持，其政策常常受制于阿拉伯国家。如在巴以和谈中，巴勒斯坦方面的任何重大举动，都要得到阿拉伯国家的默许或支持，否则将难以成行。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阿拉伯国家的介入才导致巴勒斯坦问题的复杂化：“如果没有那么多指手画脚的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兴许会容易些；没有挂在嘴边‘众志成城’为之奋斗的巴勒斯坦事业，阿拉伯国家的团结与联合自强可能还要令人更加失望……没有巴勒斯坦问题，大国对中东的插足和争夺就少了一个最佳的切入点和支撑点。”^{[16]37}

四、结语

综上所述，阿拉伯国家普遍支持巴勒斯坦人，但其中隐藏着不同的利益追求。从实质上看，阿拉伯国家对巴问题的政策，反映了阿拉伯国家在处理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关系方面的困境。学者高斯（F. Gregory Gause III）在分析阿拉伯世界对1987年被占领土巴人起义的反应时指出：“阿拉伯世界对起义的反应表明特殊的国家利益与支持巴勒斯坦这个总的泛阿拉伯义务的关系：国家利益是主要的，但不能忽视泛阿拉伯义务。泛阿拉伯义务不可能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19]214}他还具体分析了约旦、叙利亚和埃及三国在此次起义爆发后的行为：“约旦之所以做出决定与约旦河西岸脱离行政和法律关系，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地区环境来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如果他继续扮演在被占领土上的角色，那么将不能维持其政权的稳定性。因此，与约旦河西岸脱离关系的决定导致政权稳定这个特殊国家利益与支持巴解组织这个泛阿拉伯义务相一致。阿拉伯情感与在黎巴嫩的特殊利益，迫使阿萨德公开接受强烈支持阿拉法特政治路线的卡萨布兰卡阿拉伯峰会决议。为避免未来在国家利益与泛阿拉伯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利益不一致时面对戴维营协议后的两难困境，埃及致力于转变巴解组织，努力使阿拉伯世界越来越趋向接受埃及的政治解决方案。”^{[19]215}其实，不只是在1987年被占领土巴勒斯坦起义这一个问题上，在巴众多重大问题上，阿拉伯国家都有本国利益的考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萨达特时期的埃以和谈。在巴问题与收复西奈半岛之间，埃及最终选择了本国利益。但为避免阿拉伯世界的批评，埃及力图把巴勒斯坦问题纳入到埃以和谈之中。全程参加埃以谈判的埃及外交国务部长布特罗斯·加利清楚地表明了埃及坚持解决巴问题的意图：“如果巴勒斯坦自治方面的会谈不能取得进展，我们在阿拉伯世界、巴勒斯坦人民中间以及第三世界和欧洲就会失去信誉。”^{[20]80}可见，当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利益不一致时，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利益往往要服从于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利益。确如有学者所言：“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都自觉不自觉地要阿拉伯民族主义利益服从其国家利益、阶级利益和个人利益，这就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不能领导民族走向统一的要害。”^{[21]82}

[参考文献]

- [1] 季国兴,陈和丰,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战争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 [2] Hillel Frisch. Jordan and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Did Better Fences Make Better Neighbors?[J]. Middle East

- Journal, 2004, 58(1).
- [3] 穆罕默德·努曼·贾拉勒. 埃及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作用[J]. 国际论坛, 2000(4).
- [4] Mark Huband. Egypt's Diplomacy Running into the Sand: But It must still Press on with its Efforts to Revive Middle East Peace Talks[N]. Financial Times, 1997-06-25.
- [5] 赵克仁. 阿拉伯国家在巴以问题上的民族主义[J]. 阿拉伯世界, 2002(3).
- [6] Joseph P. Lorenz. Egypt and Arab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earch for Identity[M], Westview Press, 1990.
- [7] 陈天社. 埃及对外关系研究(1970-2000)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 [8] 阿兰·哈特. 阿拉法特传[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 [9] 尹崇敬. 中东问题 100 年[Z].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9.
- [10] 约旦国王敦促以色列撤出阿拉伯被占领土[EB/OL]. [2007-12-03].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61/6604642.html>.
- [11]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 埃及通向耶路撒冷之路——一位外交家为争取中东和平不懈努力的历程[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12] 摩西·马奥茨. 阿萨德传[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 [13] 杨辉. 中东国家通史: 巴勒斯坦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14] 殷罡. 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2.
- [15] 王铁铮. 中东国家通史: 约旦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年.
- [16] 黄培昭. 谁都可以打这一张牌——“路线图”前后的巴勒斯坦[J]. 世界知识, 2003(13).
- [17] 果尔达·梅厄. 梅厄夫人自传[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6.
- [18] 彭树智. 二十世纪中东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 [19] Robert Owen Freedman . The Intifada: Its Impact on Israel, the Arab World, and the Superpower[M]. Miami: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91.
- [20] 郭河兵, 朱玉彪, 陈婉莹. 加利传[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7.
- [21] 杨灏城, 朱克柔. 民族冲突和宗教争端——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Analysis of the Dual Attributes of Arab States' Support of Palestinian Cause

CHEN Tianshe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mmon interest of Arab Nationalism, all Arab states have been supporting the Palestinian's struggle. The Arab states' support provided the likelihood for the Palestinian's long cause.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different benefits which every Arab State calculated have exerted a lot of negative effects to the Palestine question. In essence, the policies of Arab states to the Palestine question have reflect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Arab Nationalism and Regional Arab Nationalism and Arab Nationalism always acts as a tool to carry out Regional Arab Nationalism's interest.

Key Words Arab states; the Palestine Question; Arab Nationalism; Regional Arab Nationalism

(责任编辑: 孙德刚)